

中国与印度:文明的对话

文明

□ 黄河

“龙象之争”喧嚣四起

大约十年前,一位在华为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们研究中心来了几位印度同事,因为公司“开始在印度投资”,那似乎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国家的真实存在。

在此之前,印度给我的印象遥远而缥缈:它似乎跟中国打过一战(因为疆界问题);在它的神话里有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知道跟孙悟空有没有关系);它是佛教的发源地(但中国却变成了正统的继承者)……与远在大洋彼岸的“Europe”和“America”相比,这个毗邻而居国度对我而言,反倒更像一段神话或者历史。

短短十多年后,随着中印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国际经济中“亚洲世纪”的到来,世界的目光突然聚集到了这对埋头发展经济的“难兄难弟”身上。在经历了近百年共同的苦难之后,两个国家一夜之间却似乎变成了“国际经济”拳击台上的对手。

一时间“龙象之争”喧嚣四起,所有的观众都在台下吹着口哨跺着脚,向两位参赛者许诺:谁打赢了就把“亚洲世纪”奖给他。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国人,在打量印度之时,便不免带上了几分拳击手式的警惕与算计。

他们或许也会像我一样,将“印度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季羡林教授那样古典而优雅的学术性研究,类似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另一类则是强调数据和实证分析的应用研究,就像现代的经济学或管理学。

在我心目中,身为季羡林高足的郁龙余教授在深圳大学创办的“印度研究

中心”,显然应该走的是“古典派”研究方向。这种研究自有其深远的价值,但对于当下中印两国的“拳击赛”中,是否能够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我自己是颇有些疑虑的。

然而,在我打开研究中心两位年轻教师主编的“印度学研究文选”《陆步集》时,这些疑虑与担忧不翼而飞,留下的只是惭愧和惊喜:惭愧于自己对当代中印文明沟通理解的肤浅,惊喜则在于突然发现原来两大文明古国的交流,除近百年西方语境下的竞争模式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而广阔的维度:那就是“文明的对话”。

文明的对话“是广阔的纬度”

正如多位学者在本书中分别论述的那样:西方社会在“个体理性选择”的价值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逞强文明”(泰戈尔语);而中国和印度则分别在“天人合一”与“梵我一如”的核心价值体系里,分别演化出了“天下大同”与“天下一家”两个既相似又不同的文明理想。

相似之处在于,两大文明中“人的存在”都不是西方文明下的“原子化个体”,而是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体”。但由于欧美文明对“非原子化”的存在模式缺乏理解,使得中印文明之间的许多深层差异,无法在以欧美文明为主流话语的现代语境下得以研究和表述。

对此,多年从事中印文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郁龙余教授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印关系”一文中,郁教授指出,在世界文明中真正称得上博大精深只有中国和印度。“而我们的印度研究专家中相当大的比例,停留在技术或数据分析上,对印度的精神文化缺乏深入研究”,甚至因此而陷入西方化的“冷战思维”模式中。

他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印度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梵我一如”,“二者具有深刻的内涵,需要我们去体味和理解。”写到此处,这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忍不住撂下一句“狠话”:如果对“天人合一”和“梵我一如”这两个中印文化的核心概念毫无认识,是一定搞不好中印关系研究的。

这并不是一位埋首书斋的学者的意气之言,而是一个日益扩展的“观念共同体”的一部份:郁教授编著的《梵典与华章》,成为温家宝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赞赏和引用的“当代经典”;而印度经济学家兰密施所创造的“Chindia”一词,也在深圳大学正式获得了“中印大同”这一意味深长的中文名称。

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2007年10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印关系是两大文明的关系,而不是两个贸易伙伴或两个国家的一般关系。”而在19年前,她的丈夫,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在同一个讲坛上呼吁:“我们的历史赋予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对全人类负有共同的责任。印度和中国同心同德可以为世界新秩序提供崭新的观念……”

中印文明沟通中的“桥头堡”深圳

2008年1月,在与温家宝总理就“21世纪的共同愿望”达成共识第二天,辛格总理在演讲中表示,面对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这一“催人振奋的历史时刻”。中印两国应该形成以下共识,“我们必须确保印度和中国共同合作,联手创建一个拥有积极的外部环境和共同繁荣的世界,而不是基于力量制衡的算计和充满敌意的世界。”而要达到这一理想中的“中印大同”,首先必须在两国人民之间搭建起“认识的桥梁”。

《陆步集》第一部份中,以“中印文明对话”为题收录的一系列对话与演讲,生动地展示出了中印两国学界乃至政商高层,对于这一“文明对话”的渴望与期待,也是本书的华彩之章,其中许多重要内容均为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所获得的独家授权。

而在其后的“印度文化研究”与“印度文学研究”部份,郁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显示出扎实的研究根底与广阔的研究视野。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从文学到文化的基础研究,“文明对话”才不至于变成概念游戏和空中楼阁。

与此同时,凭借着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印度获得广泛声誉的郁龙余教授又有了新的理想:就在不久前的一次拜访中,郁教授向我表示,他的研究中心以印度总理、印度执政联盟的主席和驻华大使等人捐出的稿费为基础,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慈善基金,目前正准备捐给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家小学。而他自己则希望以这笔捐赠为契机,创建一支长期运作的中印教育慈善基金。

此外他还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学术研究基金,以资助印度研究中心已经开始了的汉语经典引译工作。“我们现在在做的是《道德经》的印度译本。”郁教授觉得,对于在过去数千年间翻译吸收了大量印度典籍的中华文明而言,今天的回馈可谓“正当其时”——而这也正是文明对话的题中之义。

听着郁教授兴奋的讲述,我突然想起在《陆步集》中看到的一则资料:21世纪初,只有9家中国企业在印度建立了合营企业,而深圳周边的华为、康佳和TCL就占了三家——对于深圳这座以“沟通世界”为使命的城市而言,成为中印文明沟通中的另一座“桥头堡”,难道不也是“题中之义”吗?

食品企业的危机管理为何难见效?

□ 郑渝川

食品工业的GDP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连续多年位居首位,这一产业的产值越来越大,却让老百姓吃得越来越不放心。几年来,食品企业违背社会责任的丑闻接二连三曝光,几乎所有知名大企业都难逃怀疑,食品行业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

食品企业该如何开展危机管理,进而修补形象?许多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专家开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可以概括为: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把握黄金24小时)、主动公布事件真相或支持具备公信力的第三方专家(媒体、机构)披露更具体真相、勇于承担责任。如果企业按照这三方面原则(步骤)去处理危机,只要事件起因不是企业内部人士故意施恶,就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原谅

甚至同情,政府、媒体和同行也不会揪住问题不放。

上段引述的一种处置思路,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单次解决问题而言,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这也是诸多食品经营跨国企业纷纷斥巨资建立危机管理应对体系、国内企业纷纷引进模仿此做法的原因。然而,若是食品企业反反复复出现安全事故,危机管理套路即便再娴熟,聘请的公关专家再高明,企业也将逐渐失信于消费者,甚至成为撒谎失信的代表词,这方面例子在当前国内食品行业企业中并不鲜见。

实际上,无论是食品企业,还是其他类型的组织或个人,都可以预防并控制绝大多数危机。由德国飞行员帕布斯·海恩基于航空事故而总结出的“海恩法则”(每起严重事故之前都曾出现过多次小型事故、数百次事

故苗头和上千个事故隐患,却均被忽视并错过”),也可以应用到食品安全管理领域。换句话说,如果企业致力于预防风险,及时发现和根除“病源”,不断在经营管理中强化对企业观念和价值观的遵循,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绝大多数风险。

企业需秉持的经营理念 and 价值观,也就是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所有(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是特定的经济、法律、伦理等方面的义务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向客户(消费者)提供安全、质优的产品,提供正确的产品信息和售后服务。一些知名食品品牌企业高调参与慈善捐助,却在运营过程中频频侵害前述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员工、客户的利益,绝不能称为社会责任方面的合格企业。

新近出版的《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危机管理》一书,积极引入企业危机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组织管理理论等学术观点,从情景—表现—绩效这一独特的视角,在大量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基础上,独创性地对中国食品企业危机管理的现状进行了评价,对食品企业方原因造成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及原因作了探索,向企业提出了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前提和基础、提升危机能力的具体建议,值得一读。

此书作者认为,有别于其他行业企业,食品企业在面临生产等环节决策时,不仅要从经济效益的视角决策,还应纳入伦理价值判断。为帮助企业经济效益和伦理价值两个维度中取得恰当平衡,《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危机管理》书中第三章提出了可供操作的“食品企业伦理决策模型”。

而经过翔实的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此书还提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方式深刻影响着其危机管理的表现。

当前多数食品企业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只遵守法律等政府监管要求底线、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忽视员工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自由制”企业,不仅在出现事故等问题时采取消极、抵拒型的危机管理方式,而且在生产经营中也以成本效益分析结果为指针,拒绝为企业直接担负成本之外的外部性后果承担责任。第二,仍以企业利益为首要追求、以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社会利益为长期获利前提,选择性履行社会责任的“家长制”企业,往往会采取适应型危机管理方法,首先致力于“拖”、“捂”,想方设法转移舆论、政府调查等方面注意力;当这些举措被证明无效时才开始站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顺应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考虑社会责任问题。书作者指出,这两类企业都应该考虑向预防反应型组织转化,以预防反应型方式为“常态”和“非常态”危机做准备,组成跨职能的危机管理小组并加强演练、建立危机信息探测机制并使之促成对企业经营流程和标准的改进。

管理



《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危机管理》,蒋启军、苏勇著,格致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文学

□ 王云燕

一本很耐看的书

小说开头,是生活化的场景,是特写的手法,很细腻,就好像一些年度大片的开头场面,从细微处着手,有喧闹的人群,冒着热气的包子,耍杂的卖艺人,围观的众人;然后,镜头推出电影中的重要人物出场,而在《流水账》的开篇,也是写热闹的元宵节尾声中庙里的借债庙金活动,作者文笔之形象生动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仅写一张贴在墙上的春联纸就写了四百多字,写春联纸上糍糊贴的痕迹,就有非常令人难忘的比喻:“底下的浆糊未干,透出凝然四点潮红,好像针刺到了手指头,血流不出来。”这是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流水账》第一段最后的一句话,行文到此,已知作者功力匪浅。“秋暖看得手痒,伸手去剥去撕,指甲刚剪过,指头痛,还忘情地用食指沾口水去搓它。”主人公秋暖就在这里自然出场。

作者的文字很特别,很浓缩,但有时候也铺陈,有时候冷如雪,有时候也热如血,从这样的文字里流淌的是尊重生活的态度,暗流下涌动的是经过压抑的激情、凝练、冷静,这样的文字风格让人想起,好比一个武术门派,又夹杂着其他门派的精华所在,拳脚施展之际,刀光剑影到处,竟让人恍惚不已,究竟是哪门哪派呢?你看不透,看不穿,又偏有兴趣要去研究它。

既然是流水账,自然用的是口语化的文字,但有时候也用很文学化的简练的文字,比如说,作者写悲伤地哭:“他哀哀欲泣地说”。这就好像棉布上偶尔用了几根金线,叫人心里一动,眼里一亮。

写作手法上白描很多,也有时候用速写,工笔、写意都各自在需要的地方出现,作者像一个老到的画师,熟练地运用着各种画画的手法,呈现出台湾农村生活的百态。

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

文如其名的流水账式的写作构思,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生活画卷,徐徐在你面前展开,有泥土的芳香,有触手可及的终年翠绿茂密的小草,有姑娘青春飞扬的笑脸,听得见鸟鸣,闻得见花香,炊烟升起,浓浓的烟火人生。

这样的书适合留一枚书签在里面,看到哪里便夹到哪里,至少可以陪伴读者好一阵子,不会像那些文字没有厚度的小说那样,一个下午就可以浏览完毕。在繁复的章节里,有生活重重的痕迹;在那些文字里,有生活的哲理;在那些人情里,有当地的俚语,足够你去想,去回味,去遐想。

“太阳像支麦芽糖倒插在空中,黏黏腻腻,使人等不及要尝中心那颗生津止渴的咸梅子。任底下的人左舔右舔,依旧那么大。两侧舔得稍微薄了点,反而看起来更大。”这样的比喻非常独特,或者可以用奇特来形容,这让人疑惑手中握的是一卷小说吗?还是一盘影碟?还是异乡邮寄过来的天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不是一般的细,有个词叫做明察秋毫,用来赠给作者恰恰好。“几口酒汁下肚,身体中间蓄了一个温热的湖,身上硬邦邦的军服都像茶叶给泡开了。”这样绝妙的好词还有很多处。

写情爱的文字轻笔带过

“他并不是第一次吻她,但这次不一样,她不再害羞含蓄,还像是口干舌燥,近了瓶口想要喝水。”“他在交界的颈项上徘徊,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来到她胸口的双生岛,潮水正

向这无人岛涌来。”这样地吝啬了笔墨,好似那里谈论到爱情,总还是羞涩的,不开放的民风。

一个不在当地生活过多年的人,是无法写出这样带有乡土味的文学的,如果不能做天上的星星就做地上的路灯,照耀着这千年不变的乡村屋舍,在清晨里,在黄昏里,青春一如草木,茂盛过枯萎过,落入尘土,有乡野的风,有海风一起裹挟而来。

那些乡情都是原汁原味的,说的是闽南话,虽然看不全懂,也能猜个大概。祭祖的煎鱼热过上桌,秋蟹秋添一齐下箸遮住鱼眼睛,姆婆说:“不可相争,一面阿姊,一面小弟,那个头乎阿叔,这鱼头上好,没听人讲,见头三分参。”

生活何尝不是这般的流水账一样的日复一日,开心,悲伤,吃饭,睡觉,成长,谈恋爱,劳作,收获,结婚,男欢女爱,生儿育女,一辈又一辈,生命或许逝去,生活程序依然在进行,你会疑惑究竟什么才是永恒,是那些海边的礁石,还是灵魂中最深刻的爱。父母赐予我们生命,就是让我们感受这人世间的无奈和温暖的吧。

本书73个章节,章节与章节之间根本没有一点点场景时间的累积。看这本书,就好像看一个生活型的电视连续剧,60集总长,每一集都不断裂,一集接一集,一句话接一句话,又好像高手削苹果,苹果削好,一条长长的苹果皮不断裂一点,你算是佩服到家了。最后一个章节的名字叫秋日,看到此,终于明白作者是多么偏爱这个季节,连主人公一家的几个孩子名字都是秋字排名,秋暖,秋香,秋添。也许这个秋字,是作者心底的最爱。

《流水账》这本书浩繁纷杂,但每个字都刻在石头上,目光及处,如兰花手指轻拂过,那些刻痕依然有棱角,触痛了抚摸它的手指。

心理

三十几岁,一切都还来得及



《30几岁,幸福没那么难》,【韩】李武石,中信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 山之遥

我们的幸福与满足感来自哪里,是成功吗,是追逐金钱与地位就能够赢得的吗,很显然,不是,人类幸福与满足从来都不是外界因素所能影响的,它只产生于我们的内心,只有内心得到真正的自由,一个人才能够充分享受到人生最大的幸福。

《三十几岁,幸福没那么难》是韩国博士李武石所著,这是一本和大多数心理治疗类书籍都不太相同的著作,他认为,有的人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可是却无法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许是因为不太懂得处事原则,但更多情况则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内心小孩儿”,这个小孩,就是内心深处的障碍,它来自于童年所造成的伤害,在以后的日子里以无意识的形态出现,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只有明白并且消除这个“内心小孩儿”,我们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博士讲了一个叫做“休”的治疗过程,他因为处理不好与同

事的关系而遭到辞退,博士从过程中得知“休”小时候因为父亲的漠视和严厉而产生愤怒与孤独,所以工作中便总会把爸爸所带来的阴影施加到同事身上,意识到这一点,休做了改变并成功治愈。

像“休”一样,活在内心世界里而不自知的人还很多很多,内心小孩儿让我们痛苦,我们把它锁在心理监狱里,我们因为害怕所以对它视而不见。没有治愈的童年导致了性格上的不成熟,不懂事的大人不仅自己会很痛苦,也会让身边的人很痛苦,而我们只有直面自己的内心,才能摆脱痛苦。

人有愤怒、嫉妒、依赖等九种负面性格,你具有哪一种呢,内心的痛苦被唤醒后,你会感到愤怒,但那座山必须要翻越。之所以说三十几岁,一切都来得及,那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事业的辉煌期,将自己治愈,同样的痛苦便不会再复制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们传承生命时,总希望给他最好的爱,可是一个不成熟的自己只会再创造一个不安的孩子,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如果你内心也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儿,那么读此书时,你就会庆幸,真的还不晚,因为我们自身的改变,将会带给身边的人和孩子多么不同的人生。让我们学会理解学会原谅,过去的毕竟过去了,不应该总是活在旧的内心世界,这是作者想要教会我们的。

三十几岁,有幸读到此书,是人生中非常好的转折,让我们试着去谅解父母所带来的痛苦,让我们给孩子一个健康的人生,让我们直面内心,重获幸福。真的,一切都还来得及。